

# 清朝“国语”政策研究

陈力

(长江大学 文学院,湖北 荆州 434023)

**摘要:**万历二十七年,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等人以蒙古文为基础,创制满文。从满文诞生至清王朝覆灭,满语一直被历代皇帝视为“国语”,作为“国本”之一,不断地被维护和强化。虽效果不佳,但清廷苦心孤诣地维护“国语”政策,力图将旗人构建成为和汉人迥然相异的政治集团,在一定程度上,实现了巩固和加强旗人集团自我认同和民族意识的战略意图。

**关键词:**清朝;国语;政策

**分类号:**K249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3-1395(2019)09-0091-07

一个民族能够形成、发展与壮大,需要诸多条件,语言就是形成民族的一个条件。一个民族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文化为依托,换言之,每个民族都必须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。在民族文化要素中,语言的地位不可忽视,正如《清史稿》中所言:“国必有所兴立,文字其一也”<sup>[1](P9269)]</sup>。关于清朝满语政策,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。笔者在前人基础上,根据一些档案和旗人笔记、文集、家谱和回忆录等资料,对此问题重新进行梳理。

## 一、入关前国语政策

当努尔哈赤实现了女真部落的政治统一后,开始逐步实现文化统一。过去女真部落分散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,导致各部之间文化与风俗迥异,不利于女真政权的统一。

在辽、宋、夏、金时期,女真人曾依照汉字创造了女真文,并在金朝的统治区域内广泛使用。元统一全国之后,蒙古文字在女真地区迅速流行起来。“时满洲未有文字,文移往来,必须习蒙古书,译蒙古语通之。”<sup>[2](P319)]</sup>朝鲜人李民奭在书中记载:“胡中只知蒙书,凡文簿皆以蒙字记之。若通书我国时,则先以蒙字起草,后华人译之以文字。”<sup>[3](P473)]</sup>说女真话,却使用蒙古文,这对女真部落的统一和文化发展极为

不利。因此,万历二十七年,努尔哈赤任用额尔德尼等,依照蒙古字母和满语语音,创制了满文。<sup>[4](P44)]</sup>“太祖高皇帝创制国书,义蕴精微。”<sup>[5](P13)]</sup>满文一出现,就成为后金政权历史事件的记载工具和文化传统象征。“此满洲字制成之后,用以书写文书、日记、简册,即后遗留之老档,用其所记之日记、起居注诸文纂修实录,即今流传之满文实录图等书。其二,则用满文以译汉文之书……将金字翻成汉字,使金汉书共传,使金汉人共知,千万世后,知先汉创业之艰难,皇上续统之劳苦。凡仁心善政,一开卷朗然,谁敢埋没也。”<sup>[6](P45~46)]</sup>一方面,满文有利于女真人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。被征服的“语音相同”的部落民众,利用相同的语言文字进行交流,书写文章,载录政事,编著历史等,对后金人自信心的提高,彼此认同感的加强,各分散部落文化的统一,产生了积极作用。另一方面,满语与满文在后金社会生活中的推广和使用,强化了女真民族的内部联系。“在语言的沟通与掩蔽双重意义下,对话者以最狭小范围的共同语,来强调、凝聚彼此亲近的一体感。”<sup>[7](P266)]</sup>

满文创立后,努尔哈赤大力推广,但是在运行过程中,出现了不少问题。很多文字借用蒙古字母,不能完整地表达满语,造成“上下字雷同无别”,“人名、地名必致错误”<sup>[8](P156)]</sup>。于是,崇祯五年,皇太极对

收稿日期:2019-05-01

基金项目: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录附、朱批、题本荆州驻防史料抄”(2017061);长江大学“现代教育与荆楚文化研究”科研项目“清朝国语政策研究——以荆州驻防八旗为中心”(2018YZS22)

作者简介:陈力(1979—),男,湖北黄陂人,副教授,博士,主要从事清史研究。

满文进行改进,将借用来的蒙古字母加上圈点,使满文在字型结构、语音拼读、语法规则上更加完善,解决了老满文出现的各种问题。满文的推行,使女真族获得一种统一规范的文字。达海因在改造满文过程中功劳卓著,“满洲群推为圣人”<sup>[1](P9258)</sup>。

满文的出现,为后金、清朝确立了文化上的自主性和合法性。“我国初无满字,额尔德尼乃一代杰出之人,今也则亡,彼所造之书义或有在。其后巴什库尔缠所增,朕恐终有未合,尔记载诸臣将所载之书,宜详加订正,若有舛伪之处,即酌改之。朕嗣大位,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,若不一一备载,垂之史册,则后世子孙无由而知,岂朕所以尽孝乎?”<sup>[8](P214)</sup>满文的创制和广泛使用,对女真社会与国家,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各种军令、政令、文书、法律条文等等,均使用满文。“若仍要以语言作为区分民族的工具,首要之事,就是必须从既存的优势语言当中,选择一种作为国语(通过标准化与同一化的过程)。”<sup>[9](P54)</sup>在入关以前,后金统治范围内所有的人名、地名、地名,均用满文。《满文老档》等文书,都用老满文写成。努尔哈赤曾下命各固山额真等官员以满文书写誓言。<sup>[10](P101)</sup>甲兵以上官员,均要求用满文书写誓言,留档以备查看,每牛录派出十人写档子。<sup>[10](P221)</sup>一牛录有十人能够以满文记录档案,懂满文的人自然就更多了。长久以来,旗人形成尚武的传统,“马前俘获,立授官阶。帐外受降,加之章服。一材一艺,皆争自濯磨,以供后先奔走之用”<sup>[11](P5299)</sup>。在满文推行和广泛使用后,八旗的文化传统通过民族语言得以保存和流传,极大地影响了旗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。探求义理、忠君报国等儒家思想,也成为了八旗子弟孜孜以求的目标。

在入关前,后金、清朝统治者一直强化满文的“国语”地位。天聪八年,太宗上谕,将满文的使用与后金国运联系在一起。皇太极要求,金国内原来所有使用汉语的地方,都改为满文,违者严惩。<sup>[8](P237)</sup>所以绝大多数旗人不通汉文,但都精通满文。

尽管有一些人类学家认为,语言与民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,但是,“语言是最显著的民族学标志”<sup>[12](P6)</sup>。清朝皇帝们将满语视为满洲民族认同的基础。魏源在《圣武记》满洲开国史中记载,太祖、太宗用兵顺序及为何如此用兵时,语言异同是一个重要标准。“大清国之兴也,肇有金、辽部落,继兼有元裔之蒙古,继兼有朝鲜,又继有明之关外。金、辽,语言相同之国也;蒙古语言、居处不同,而衣冠、骑射同之国也。至朝鲜及明,则语言、衣冠皆不同。故我太

祖、太宗用兵次第,亦因之为先后。”<sup>[13](P1)</sup>万历四十三年,因叶赫女改嫁蒙古,诸大臣、贝勒鼓动努尔哈赤出兵叶赫。但努尔哈赤予以否决:“不可!尼堪兵出边相助叶赫防守,想是天所裁定,希望其能长久。叶赫与我们是不同语言之珠申国呀!”<sup>[14](P3)</sup>但是在万历十九年,叶赫贝勒遣使对努尔哈赤说:“乌拉、哈达、叶赫、辉发、满洲,言语相通,势同一国。”<sup>[15](P63)</sup>天命三年,努尔哈赤对诸大臣曰:“欲使同一语言的珠申国,不要分居在不同的很远的地方,都收集在一处。”<sup>[14](P75)</sup>由此可见,在后金、清朝皇帝的眼中,民族和语言紧密相连。“夫草昧之初,以一城一旅敌中原,必先树羽翼于同部。故得朝鲜人十,不若得蒙古人一;得蒙古人十,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。族类同,则语言同,水土同,衣冠居处同,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。故命文臣依国语制国书,不用蒙古、汉字。”<sup>[13](P9)</sup>对于后金、清朝统治者而言,推行同一语言的部落最为重要。天命四年,努尔哈赤消灭叶赫之后,统一女真部落。《满洲实录》中记载:“同一语音者,俱征服。”<sup>[16](P284)</sup>在朝廷强制推广国语的情况下,绝大多数的旗人都精通国语。除了当时的八旗子弟,一些被掳掠的汉人进入后金后,也熟练掌握了满语,与真正的女真人打成一片。

为了让普通百姓更有效地学习满语,皇太极“命儒臣翻译《三国志》《辽》《金》《元史》,性理诸书”<sup>[17](P2448)</sup>,以此为教材,大力推广。天聪七年,皇太极命令孔有德、耿仲明,“一切军器,令军士勤于演习,勿间断。旗纛俱用早色,马匹各用印烙,系印牌,以满洲字书本主姓名及本管官衔”<sup>[15](P415)</sup>。将部下所有马匹打上烙印,并制作了用满文的字牌,上面记有马匹主人的名字以及上级官吏的职衔,以备马匹丢失之后,易于找寻。<sup>[18](P33)</sup>崇德三年八月,皇太极再次下令:“军士盔后及甲背,俱书号记,盔耳叶皆用圆铁叶,无盔甲者,衣帽后亦书号记。一切军器,自马绊以上,俱书号记。马必系牌印烙,不印烙者,罚银二两,箭无号记者,罚银二十两。”<sup>[18](P365)</sup>

## 二、清初国语政策

“开国之初,综满洲、蒙古、汉军,皆通国语。”<sup>[19](P2878)</sup>尽管清初旗人满语水平极高,但为了防微杜渐,清廷仍通过行政手段维持满文的地位。顺治二年,“各坛及太庙读祝,停读汉文,只读满文。仍增设满读祝官八员,一切典礼,俱照国朝旧制行”<sup>[20](P165)</sup>。为了让旗人更好地学习满文,清廷加大对满文教材的编撰和翻译工作。顺治十年,世祖

亲撰《劝学文》,将“五经”翻译成满文。十二年,顺治帝又翻译《孝经》《格言》《南宋演义》《唐代演义》等书。在满语教育方面,顺治帝为了让宗室专习满文,直接取消了他们学习汉文的机会。即使在旗人们精通满语的状态之下,顺治帝依然上谕,批评不专心研习满语的旗人。

圣祖汉语水平很高,但他非常谨慎地提防旗人的汉化,所以康熙帝要求八旗幼童,必须学满书、满语。一方面,清廷对一些精通满文的旗人给予奖励。如辅政大臣索尼,因为精通满语,被康熙帝赐予巴克什的称号。这种政策的效果非常明显,即便是康熙帝的皇子们都能够流利地讲满语。另一方面,康熙帝力图保护、保存满洲文化。康熙十二年,上谕学士傅达礼,要求将满文词汇及用法编纂成一书,但希望诸臣编书时,无需急躁。“宜详慎为之,务致永远可传,方为善也。”<sup>[21](P94)</sup>为了巩固满文的国语地位,刑部奏献全部为满文。直至康熙四十三年,刑部尚书王掞认为刑部供状均为满文,导致汉臣形同虚设,清廷才实施满汉文并具之制。有一些旗人因懂满语,仕途坦荡。如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,无功名亦无世职,在户部学习,默默无闻。但他因通晓满文,在顺治九年被授职为宗人府主事,累迁户部督捕理事官;康熙元年,任顺天府尹,次年跃居四川巡抚高职。<sup>[1](P9800)</sup>广州驻防汉军王文辅,由于精通国语,将军永玮极为器重其人,“管理将军印务”。驻防地设立书院,“以文辅为之师”,军中大小事,“将军每与商榷”。<sup>[22](P490)</sup>在康熙帝的倡导下,许多汉军旗人开始努力学习国语。郭世隆学成之后,将五经和日用名物象数等,翻译成满文。

为了保持八旗臣工的满文水平,康熙帝要求旗人具折时,必须亲手以满文书写。康熙五十五年,广东巡抚法海奏言:“奴才法海自幼庸懦不及,不通满书,缮写满字亦甚劣,所学差且弃置年久。密奏之折不可由别人代写,奴才法海既系满洲巡抚,故尽力以满文缮折具奏。奴才甚不敬,不胜悚切,伏乞圣主宽宥。为此谨奏。”为了让法海坚持学习满文,康熙帝鼓励道:“字劣有何妨?事密即好矣。”<sup>[23](P1165)</sup>康熙帝要求旗人官吏,以满文具折,有两个目的。一是为了加强清廷文书的秘密性,避免国家机要泄露。二是通过满文具折,可以维持旗人的满文使用水平。如若旗人不能亲手具折,必须请奏朝廷,得到皇帝的同意方可。“江西巡抚奴才白潢谨奏:奴才年齿渐老,眼目渐昏,奏事折子不能自写,又念折子有关系紧要,不敢假手他人。嗣后,奏折令奴才儿子白映槐

代书,相应奏明。”<sup>[24](P597)</sup>

对重视“国语”的旗籍大臣,雍正帝即给予嘉奖。西安将军曾要求,“八旗闲散子弟……读清文,教学满洲话”。世宗在奏折中,满意地批示:“理当勤勉者。”<sup>[25](P1433)</sup>为了提高八旗子弟的满语水平,雍正帝兴办各种旗人学校,学习满语课程。雍正七年,世宗指出,八旗汉军都统所处理的事务,使用“清文之处居多”,“汉军子弟,学习清文,甚属紧要”。于是,决定汉军各旗“就近地方”,“立一清文义学”,并在八旗满洲选择“人品端方,通晓清文者二人,以充教习”。<sup>[26](P956~957)</sup>

清廷初设义学,学生多为汉军大臣官员子弟,一般子弟很难入学读书。为满足更多的汉军学习满文,清廷设立满文学舍。与此同时,清廷通过官职升降法,鼓励八旗兵丁学习满语。雍正帝多次强调,如果八旗汉军不能用满语书写履历,一旦遇有升转,连列名的机会都没有。正红旗汉军骠骑校赵天辉,因弓马骑射诸方面表现卓越,雍正八年,被保举担任防御之职,却因不能用满文书写履历,虽已补缺,但清廷暂停发俸禄,以示警训。两年之后,他的满语水平仍没有长进,清廷停发其俸禄。

雍正年间,清廷规定:凡是入学的汉军子弟经过“专习清文”,如果“文理精通”,愿意考取翻译的,“具准赴吏部考取笔贴式”,“文理精通”,弓马“可造者”,“听其在本旗挑补领催、兵丁”。这对于汉军是一个极好的晋升机会,但前提是需要较高的满汉文翻译水平。<sup>[27](P1328)</sup>雍正九年,世宗上谕,在八旗满洲、蒙古、汉军中选择“年少无疾,骑射不堪,不能满洲、蒙古言语之人”,共计一千在西广子圣化寺等处设立一营,学习满洲“一切技艺”,并要求“营内一概不许汉语,惟习清语或蒙古语”。<sup>[28](P991)</sup>雍正十一年,世宗又上谕:“汉军人等,学习清语,原为年富力强者”,经过义学教育后,还“不能清语,概不拣选”。<sup>[27](P1979)</sup>雍正十三年,正红旗汉军副都统指出:“圣主再三降旨,命汉军旗人学习满语”。但是,“先时八旗汉军一切奏折、绿头牌俱用满字书写,后皆改用汉字”。这直接导致汉军满文水平直线下降,“年久之后,汉军旗从学习满语、满字者,渐至稀少,以至不能仿效满洲礼法”。所以,他奏请:“八旗汉军一切奏折、绿头牌仍照旧例,用满字书写。”如此一来,才能使汉军“学习满语,效法满洲礼法,八旗奏事亦能画一”<sup>[29](P168~169)</sup>,雍正帝深以为然。“去年因雄县兵丁骑射不堪,不能清语”,雍正帝一气之下,将该处的协领、防御等官员全部革职。故



而,良乡等地的旗人从上到下,“人人咸惧,奋勉力学”。<sup>[30](P26)</sup>

在旗人被汉化的大环境下,高宗成为满语和旗人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与拥护者。在维护国语方面,乾隆帝比其父亲更为勤勉,登基伊始就上谕总理事务王大臣,要求部院奏事,满汉文兼用。“从前当皇考元年、二年间,各部院奏事,俱兼清汉文。近见只用汉文者甚多,著谕各部院,嗣后凡奏事,俱兼清汉文具奏。”<sup>[31](P250)</sup>为了防止旗人被绿营官缺之后,放弃满文学习,清廷反对旗人任绿营之缺。在乾隆年间,清廷掀起一场捍卫“国语”地位的政治浪潮。乾隆四年,高宗谕令扩大“国语”的使用范围。乾隆七年八月,高宗又上谕:旗人在齐集之处,无论八旗大臣,还是士兵,必须讲满语。乾隆十七年,盛京笔贴式永泰,尽管是翻译出身,但满语生疏,乾隆帝极为不满,传旨进行申飭。乾隆十八年,上谕八旗子弟,将国语骑射能力作为提升或斥退他们的重要标准,一些旗人因不精于国语骑射被降旗。杨氏原为满洲旗人,因对满语不娴熟,被降为汉军旗人。“吾家初隶满洲正黄旗,先高祖归自广西,高宗以清语问答,未能娴习,命改汉军,自是始为汉军正黄旗人。”<sup>[32](P386)</sup>杨钟羲曾祖在乾隆年间,护理广西巡抚,后迁刑部侍郎,入京觐见。由于不能以满语奏对,乾隆帝将之由满洲正黄旗降为汉军正黄旗。

为了锻炼旗人的满文书写能力,乾隆帝与其祖父一样,特别强调旗人上折时,必须用满文。乾隆十九年十月,总兵官诺伦用汉文上谢恩折,乾隆帝认为他受汉人习气影响,传谕要求八旗官员奏折须用满文。为了考察旗人的满语口语水平,乾隆帝要求奏对之时,必须全用满文。如果表达太差,轻者责斥,重者革职。乾隆三十四年,上谕内阁:“今日召见广东按察使富松,奏对全以汉语,深染汉人习气,伊系富达里之子,久任道员,一味养尊处优,自耽安逸,不复知有满洲旧风,岂可令其仍居外任,富松著留京候旨另用。”<sup>[33](P1961)</sup>对于一些勤于学习满语,满文精熟者,乾隆帝大加赏赐。乾隆二十三年,上谕内阁:用资济银之息,奖励国语骑射优长之旗人。<sup>[33](P3263)</sup>

对于宗室的满语水平,乾隆帝颇为重视。他认为宗室贵为天潢贵胄,更应该以国语为本务。高宗采取各种手段,让宗室专习满文。乾隆二十三年,清廷规定:八旗满洲、八旗蒙古三品以上文武官员之子弟,凡是参加科举考试者,必须“国语”与骑射均可观,才能入场考试。乾隆二十六年,理藩院官员觐见皇帝,高宗发现其中“四人,不但清语生疏,甚至有不

能者”。乾隆帝大发雷霆,异常愤怒,斥责道:“伊等皆满洲官,所办又系满洲事务,不谙清语,何以办事?”他认为,必须对“国语”生疏之旗人进行训诫。乾隆二十九年,高宗下令宗室继承爵位之时,不分嫡庶,以满文及骑射优长者直接袭之。

为了使旗人更好地学习满文、满语,乾隆帝还大力修纂满文史书。乾隆十二年,高宗发现满文《金史》错误太多,令大学士讷亲等人进行斧正。在清朝,由于满文译者的水平与习惯不一,导致许多人名、地名翻译得千奇百怪。乾隆帝大为不满,开始采取措施,将这些基本词汇统一起来。乾隆十五年,高宗下令将《清文鉴》等书加以整齐划一,便于初学满文者记诵。在翻译过程中,乾隆帝极力反对满汉混杂,除了人名、地名不需要翻译成清语外,其他的一律用清文,不许“杂以汉语”。乾隆十三年,高宗制满文篆字,并命臣下“融会篆体”。其收藏二十一枚“皇帝之宝”均用新定清字篆文,“并令内外各官印信,俱行更换”。在经筵讲学之时,将《四书》等先用汉文诵读,然后用满文讲解。<sup>[34](P1563)</sup>乾隆帝将满语与汉语进行对译,有两大作用。第一,清廷将各族文书,包括汉族文书翻译成为满文,确立了满语与满文的中心地位。它是清廷为民族融合所做的努力,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。第二,面对旗人日益衰退的满语能力,通过大规模的翻译行为,唤醒旗人的语言意识,为旗人学习、阅读满文提供大量的书籍,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。

嘉庆皇帝继大统之后,也十分重视旗人的满语学习,他主张旗人从小就应该学习满文。“满洲素以骑射、清语为重,即随时训谕,亦恐未臻谙熟……国语本应不学而能,而骑射亦须童年练习。”<sup>[35](P2034)</sup>随着科举风气渐浓,越来越多的旗人,纷纷涌入博取功名的大潮之中。就在他们参加科举的热情日甚一日之时,研学满语的动力却日渐衰弱。为了使八旗子弟全心学习满语,清廷不得不禁止驻防旗人参加文科科举考试。嘉庆帝规定旗人具折必须用满文。内阁丰绅在接受皇帝钦赐御书后,用汉文写谢恩折。嘉庆帝龙颜大怒,申飭丰绅。“朕制木兰记凛遵前训行围校猎,以彰满洲旧业。丰绅系满洲世仆,理宜缮具清字折谢恩,乃竟用汉字折,已属非是。且折内多用浮词,颇染汉人习气。丰绅,著申飭。”<sup>[36](P555~556)</sup>嘉庆十七年,黑龙江将军宗室德静在谢恩折中用汉字骈文书写,遭到嘉庆帝严厉申斥:“嗣后,谢恩奏折均用清文,不准再书汉字。”<sup>[37](P140)</sup>荆州驻防噶勒柱,被同僚所弹劾,将其押送至京。“上幸圆明园,噶

勒柱伏道旁中。上问为谁,左右以名对。上曰:“是荆州驻防善清语者耶?”因以国语诘之。噶勒柱以国语自陈事,得白。”事后,因噶勒柱清语流利,迁为三等侍卫,不久又升任副都统。<sup>[38](P1715)</sup>额勒登保被嘉庆帝称为东北三省人杰,但其不识汉文,所有汉文奏折文牒,均倚倚幕僚完成。但这一切不影响额勒登保行军打仗,官运亨通。在嘉庆朝,旗人的满语能力在不断衰退,但是他们依然对满语充满自信。一些旗人就认为:“满语要比汉语表达得更加清楚和真实。”<sup>[39](P110)</sup>

### 三、晚清国语政策

道光八年,盛京副都统常文赴京觐见宣宗,在谢恩折中,竟违背常例,用汉文奏陈。“宣宗怒其忘本,即命革职。”按照清廷旧制,八旗子弟向皇帝请安、谢恩之时,应用满文上折。<sup>[17](P2244)</sup>道光十五年,清廷进行满文考试,宣宗对其中不识满文者,大加斥责:“考试满蒙侍郎以下,五品京堂以上清文。钦定题目,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,其宿学之人尚能翻译者,不过十之三四。竟有不识清书,已名持以问人者,寔不能落笔以白卷书汉字,衔名而进。上亦无如何也。降严谕申饬而已。有玷乃祖乃父之语,不知当之者,有何颜也。”<sup>[40](P93)</sup>伊兴额原名为伊清阿,在入京召对时,宣宗认为其名字不合清语,下命改名为伊兴额。<sup>[1](P12104)</sup>道光二十三年,宣宗批评驻防八旗子弟,“鹜为虚名,浮华相尚”。他要求旗人参加文试之前,“必应试以翻译,庶不专习汉文,转荒本业”<sup>[38](P599)</sup>。为了维护、巩固满语的“国语”地位,清廷再次取消驻防旗人报考文科科举的资格,他们只能参加为旗人特设的翻译科考试。道光二十四年,宣宗谕令:“现在各省驻防旗人,一体改试翻译。其已中之文举人,因未与文闱会试,遂议定不准大挑。”<sup>[41](P60)</sup>为此,道光帝解释曰:“八旗根本,骑射为先,清语尤其本业。至兼习汉文,亦取其文义清通,便于翻译。乃近年以来,各驻防弁兵子弟,往往鹜于虚名,浮华相尚,遂至轻视弓马,怠荒武备,其于应习之清语,视为无足轻重,甚至不能晓解。”<sup>[42](P340)</sup>清廷强令驻防旗人参加翻译科考试,对维护他们的满语能力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。斐仁阿为满洲镶白旗人,自幼聪明。因为驻防改试翻译,“遂精清文”<sup>[38](P2172)</sup>。启功回忆先世,曾谈到自己曾祖通过研习满语,参加翻译科考试搏取功名之事:“我的三曾祖,也袭奉国将军,他和我曾祖一样,也决心走科考道路,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仕途。但他觉得自己的汉文不行,便习满文,考武举,

被满缺,后来他还主考过满文,最后官至翰林”<sup>[43](P22)</sup>;“我外高祖的五儿子,叫崇纲,就是我的外曾祖,他精通满文,做到驻藏帮办大臣。……我的三外祖叫克诚,也懂满文和蒙文,他在我三曾祖主考时,还发现他出的满文题目有错误。后来曾担任过咸安宫的满文教习”<sup>[43](P25)</sup>。

咸丰四年,文宗上谕八旗,认为不懂满文就不是真正的旗人。他谈到其父为了使八旗子弟返朴归真,“停止驻防文试”。如今又见旗人,“专习汉文,于清语、清字全不讲求,沾染习气,徒务虚文,实堪痛恨!”有鉴于此,文宗决定:“嗣后,无论何项出身人员,均宜练习清文,通晓讲解。即由文乡会试入仕之员及兵丁子弟,亦应一体练习,不准怠惰偷安,以误根本。”<sup>[30](P78)</sup>

为了使八旗子弟更好地研习满文,文宗对满文教材极为重视。他遵照高宗朝《钦定翻译五经新语》,详加厘定,谕武英殿以满汉合璧,刊印此书,颁行天下,“俾各士子讲习有资,用昭法守”<sup>[22](P35)</sup>。咸丰十一年,为了扩大旗人的登进之途,允许驻防旗人参加文科科举。但文宗强调:“驻防八旗人等,仍不得以专务汉文,致将翻译国语稍涉荒废。”<sup>[30](P110)</sup>肃顺为咸丰朝权臣,他能够得到文宗赏识,与其熟练满语水平有一定的关系。一日,文宗有事出门,用满语吩咐御前大臣克勤郡王,说要骑“托拉马”,郡王不懂。肃顺当时在銮舆卫当职,耳语郡王:“皇上要骑红沙马。”文宗令肃顺报名,问其满汉文字,皆对答如流。文宗非常高兴,立即超擢肃顺为御前侍卫。

在对外交往中,所有的文件和文书必须有满文版本。咸丰八年,在与美国签定《望厦条约》时,中国钦差大臣所用之印章,“镌刻着汉、满两种文字”<sup>[44](P180)</sup>。在咸丰朝,满文的使用面比较广。许多汉人能经常见到满文、满书,发现书写满汉两文的姿势有所不同。“各家字体各家风,自古鸾龙异样雄。试看旗人开笔阵,清书不与汉书同。”<sup>[45](P77)</sup>醇亲王奕譞谈到,在晚清宫廷中,满语教育非常受重视,“余入学,遵例兼习满洲语言、文字”。老师们均为朝廷重臣,他们“精于翻译”,且能“悉心教导”。但是,奕譞承认其习至十六岁,“尚不能以清语问答”。一日,忠亲王以清语与其交流,“竟瞠目不能对”。一旁的太监微笑云:“王爷所问,不过骑马坐车诸浅近语,何竟不能答耶?”奕譞大受刺激,“既羞且愤,决念学习”。经过三年的研习,“始渐有成”。后来,他对满语、满文能够“问答如流”,处理满文公牍极为从容。<sup>[37](P530)</sup>同治四年校刊《户部则例》中规定:凡奏

折中汉字,必须移送军机处翻译成满文。“东三省有具奏事件,俱缮写清折。倘遇言语繁多之事,兼缮清汉字具奏,不得仅缮汉字。”<sup>[46](P7163~7164)</sup>

光绪年间,危机四伏、矛盾重重,但清廷依然重视国语之地位。内阁学士文硕在《请厘正奏议体裁疏》中,向光绪帝建言:“满洲世仆叩谢天恩等事,例具清文陈奏,蒙古、汉军亦从之。”此乃“满洲旧俗”,“不容轻易”。<sup>[37](P138)</sup>四川盐茶道玉铭为内务府包衣旗人,因不能讲满语,汉字也不精通,被光绪帝罢去官职。<sup>[47](P277)</sup>光绪三十一年,清廷考满京官,“先试以满语能答者,令其书写,见起后,试以汉论”,将能满语者列东边,而考试汉文者坐于西边。<sup>[48](P87)</sup>伊克坦在担任满蒙文学堂监督时,上奏请达海从祀文庙。他认为达海创定满文,翻译经史,有功圣教。“达海于圣经有表章之力,于后学有津逮之功”<sup>[1](P12819~12820)</sup>,其地位不亚于许慎,清廷对此深以为然。在清廷的努力下,懂满语的旗人大有人在。在八旗上层,许多家庭书信、日记和公文,还是用满文书写。<sup>[49](P27)</sup>甚至有些大臣只懂满语,汉文一字不识。曾担任黑龙江副都统达三十年之久的旗人阿勒浑,公文除满文之外,一概不读,根本原因在于,“不识汉字,无论汉文矣”<sup>[50](P16)</sup>。

荣禄贵为军机大臣,处理满汉奏折成千上万,然其“于汉文不甚通晓”,遇到草拟诏旨,需他人代笔。到了清末,尽管大多数的旗人已对汉文、汉语非常熟悉,但清廷还是固执地将政府文告译成满语,再颁行天下。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,内阁奏请摄政王载沣:“恭上○○皇太后徽号,应用清文、蒙文字样”<sup>[49](P308)</sup>。

溥仪曾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谈到,自己的满文极为糟糕,学习了许多年,也就会一句话“伊立”(平身之意)。<sup>[51](P64)</sup>尽管如此,在宫廷中满文教育依然在延续。“皇帝冲龄践祚,寅绍丕基,现当养正之年,亟宜及时典学,以裕圣功,而端治本。……至于国语清文,乃系我朝根本,著派记名副都统伊克坦随时教习,并由监国摄政王一体照料。”<sup>[49](P406)</sup>辛亥革命后,在溥仪小朝廷,伊克坦仍兢兢业业地为小皇帝教授满文。“他所接受的职责,是为皇帝讲授满文,或者不如说是要保证皇帝不至于完全忘记祖先的语言。”<sup>[52](P140)</sup>在溥仪大婚时,“窗外还有一个官员用满语高声念诵祝瓶词”<sup>[53](P132)</sup>。

#### 四、结语

清朝帝王们坚持维护八旗的俭朴之道,极为详

细地规定八旗子弟日常生活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。这些制度和规范,在维护旗人的民族特性,防止旗人汉化这方面,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虽然在日常生活中,强迫旗人说满语、写满文,是非常困难的事情,但是清廷通过制度上的奖惩和规训,增减甚至剥夺八旗子弟俸饷发放和其他待遇,来维护满语的国本地位,却非常容易。满语作为旗人的民族方言,虽然使用范围越来越小,“就像是一件祖先遗留下来的古董,虽然早就没有多大用处”<sup>[9](P33)</sup>,但是在旗人心里,满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。民国时期,一些旗人的后代纷纷修满文族谱,力图通过满文唤起旗人的历史记忆。“满洲人文字语音,传至大清国末页,国运将衰,变法新章,兴立学校。满人我不读满书者,自此满文不振,满话依然断绝,满人祖制日见远之一日矣。仅存姓氏、父母等语,尚未改革,呼父曰阿玛,呼母曰鹅娘,即是开辟国语的原文,趁此改原期短。我族初修谱牒之举,追查源本,传示后世子孙,务得保守族宗久远根据,勿使满洲国祖制扫灭,满洲国书籍、满文、家庭、礼乐等件,毫无存在,凡满人供奉倭什晕之家,遇有丧事,必使挖单即是黄布一方,遮蔽卑古之句,避之孝服,详细考究,主吉不主丧之意。”<sup>[54](P91)</sup>

金启琮说过,旗人虽然使用汉语,但其语音、语调多为满音、满调。<sup>[55](P7)</sup>北京话受满语的影响最为明显,“北京话的语音不是汉族(保留在江南的)传统的语音,而满蒙语音主导地位的‘胡音’”<sup>[55](P131)</sup>。即使在现代,满音在荆州、成都、广州、镇江、青州等地依然存在,“嗯哪”(是)、“磨叽”(不爽快)、“别扭”(不自在)、“罗嗦”(絮叨)等词语,都是满语的遗留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赵尔巽,等.清史稿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
- [2]潘喆,孙方明,李鸿彬.清入关前史料选辑(第1辑)[M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85.
- [3]潘喆,孙方明,李鸿彬.清入关前史料选辑(第3辑)[M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1.
- [4]清太祖实录(一)[A].清实录(第一册)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5]阿桂.钦定满洲源流考[M].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73.
- [6]谢国桢.清开国史料考[M].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67.
- [7]王明珂.羌在汉藏之间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8.
- [8]清太宗实录(一)[A].清实录(第二册)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9](英)埃里克·霍布斯鲍姆.民族与民族主义[M].李金梅,译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0.
- [10]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,中国社会科学版历史研究所.满文老档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0.
- [11]张廷玉.清朝文献通考[M]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0.



- [12](苏)符拉基米尔佐夫.蒙古社会制度史[M].刘荣焌,译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80.
- [13]魏源.圣武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[14]广禄,李学智.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[M].台北:台湾中华书局,1971.
- [15]阿桂.清朝开国方略[M].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73.
- [16]满洲实录(一)[A].清实录(第一册)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17]徐珂.清稗类钞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.
- [18]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.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[M].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1989.
- [19]杨钟羲.雪桥自订年谱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.
- [20]清世祖实录(一)[A].清实录(第三册)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21]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.康熙起居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[22]长善,等.驻粤八旗志[M].沈阳: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2.
- [23]王小虹,等.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6.
- [24]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.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[M].北京:档案出版社,1985.
- [25]第一历史档案馆.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[M].合肥:黄山书社,1998.
- [26]鄂尔泰,等.八旗通志初集[M].长春: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,1985.
- [27]清世宗实录(二)[A].清实录(第八册)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28]赵之恒.清世宗圣训[M].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8.
- [29]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.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满文谕折(第5册)[M].台北:国立故宫博物院,1979.
- [30]希元,等.荆州驻防八旗志[M].沈阳:辽宁大学出版社,1990.
- [31]清高宗实录(一)[A].清实录(第九册)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32]刘庆华.满族家谱序评注[M].沈阳:辽宁民族出版社,2010年.
- [33]赵之恒.清高宗圣训[M].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8.
- [34]杨钟羲.雪桥诗话三集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.
- [35]王钟翰点校.清史列传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9.
- [36]清仁宗实录(三)[A].清实录(第三十册)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37]富察恩丰.八旗丛书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2.
- [38]荆州市地方志办公室.荆州府志(光绪朝)[M].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6.
- [39](英)马礼逊夫人.马礼逊回忆录[M].顾长声,译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
- [40]奕赓.寄褚备谈[A].续修四库全书(第1181册)[C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41]清宣宗实录(七)[A].清实录(第三十九册)[C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42]特登额,等.钦定礼部则例[M].台北:成文出版社,1966.
- [43]启功.启功自传[M].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3.
- [44](美)卫斐列.卫三畏生平及书信——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[M].顾钧,江莉,译.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
- [45]林孔翼.成都竹枝词[M].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6.
- [46]托津,等.钦定户部则例[M].台北:成文出版社,1968.
- [47]李岳瑞.春冰室野乘[M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2.
- [48]谢兴尧.荣庆日记[M].西安:西北大学出版社,1986.
- [49]爱新觉罗·载沣.醇亲王载沣日记[M].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14.
- [50]张祖翼.清代野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- [51]溥仪.我的前半生[M].北京:群众出版社,2003.
- [52](英)庄士敦.紫禁城的黄昏[M].陈时伟,等,译.济南:山东画报出版社,2007.
- [53]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.晚清宫廷生活见闻[M].北京:文史资料出版社,1982.
- [54]李林.满族家谱选编[M].沈阳:辽宁民族出版社,1988.
- [55]金启琮.金启琮谈北京的满族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9.

责任编辑 刘春丽 E-mail:157476703@qq.com